

清代承德 社会经济变迁

赵艳玲

付际红 著

黄大伟

辽宁民族出版社

© 赵艳玲, 付际红, 黄大伟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承德社会经济变迁 / 赵艳玲, 付际红, 黄大伟著.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80722-483-9

I. 清… II. ①赵… ②付… ③黄… III. ①社会变迁-研究-承德市-清代 ②经济史-研究-承德市-清代
IV. K292.23 F1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9570 号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8 $\frac{5}{8}$

字 数: 230 千字

印 数: 1-1000

出版时间: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吴昕阳

封面设计: 杜 江

责任校对: 侯俊华

定 价: 25.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345

邮购热线: 024-23284335

E-mail: lnmz@mail.lnpgc.com.cn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本课题的研究，是2003年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研究从庄田及庄田经济入手，庄田经济是清代特有的经济形态，清代的庄田分布在盛京、京畿、热河三个地区。从热河（雍正十一年后热河称承德，本书为了名称上的统一，统称为承德）庄田的建立及其作用看，既不同于后金政权在东北地区的庄田，也不同于入关之初在京畿地区500里圈地占庄所形成的庄田。承德庄田建立之初仅是为了解决清入关圈地造成的社会危机，但起到的作用却远远超过了当初的设想，它带动了承德经济的开发、发展，而承德经济的开发、发展为承德避暑山庄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康熙、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的活动又促进了承德的进一步开发，承德社会经济也随之不断变迁。

承德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这里呈现出由茫茫草原而成为农田夹杂于草原间再到成片的良田的景象；承德也由名不见经传的热河上营小村发展为清廷第二政治中心再到无足轻重的边远小城；这一地区由蒙古牧人的逐水草而居到满、蒙、汉、回等各族聚居共生。巨大的社会变迁使长城口外的承德政治管理上与内地一体化、经济上成为农业半农业区，呈现出各民族和平共处的社会状态，这一开发、发展较其他地区要早，在乾隆中期已经完成，为清代边疆开发、边疆民族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我们研究清代承德社会经济变迁首先就下列问题作一个交代：

承德在清代最初称热河，是蒙古人的驻牧地，游牧于此的蒙古各部从1628年陆续归顺后金，1634年后金（1636年更国号为清）在该地实行盟旗管理制度，以此为标志对该地区实行有效管理，直到

1912年清帝退位。本书叙述的清代承德时间上近三百年。

清廷设热河总管、热河副都统、热河都统对该地进行管辖，管辖范围包括卓索图盟、昭乌达盟等21旗，嘉庆年间木兰围场归该都统管辖，从现在看其辖区相当于今长城以北的河北省承德市、内蒙古赤峰市和辽宁省朝阳市、阜新市等所辖地区。所以本书涉及的范围超出了今天的承德市。

承德在清代的发展中，避暑山庄的建立对其影响深远，所以我们以清朝在此建立盟旗制度始到避暑山庄建立为清代承德初期；从避暑山庄建立到乾隆帝退位为清代承德发展期；从嘉庆帝继位避暑山庄衰落到清帝退位为清代承德后期；分成清代初期避暑山庄建立前的承德，清代中期承德社会经济的发展，清代后期承德社会经济的变迁，在叙述过程中，由于围场的特殊地位所以单独成章，为第四章木兰围场的兴衰。

二

清代承德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首先在经济格局上表现为由游牧经济渐变为农业半农业区。热河地区靠近明长城，所以整个明朝这个地区战争相随，游牧被驱赶，甚至有的年代明政府在近边三五百里乘风烧荒，使马无所食，造成该地蒙古人口锐减，游牧经济一度出现衰落趋势。皇太极时期对归顺的各部蒙古先是无偿的接济，后是采取稳固的经济措施：安排牧场、赐予牲畜、拨给钱粮、划定牧地等措施，使他们安居乐业，清康熙以后，热河地区畜牧业走出低谷，出现了生计周全、牲畜繁盛的牧业经济复苏景象。然而，游牧经济本身的脆弱，固定游牧地政策的实施，造成游牧社会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清朝建立后，此地战争的消除为农耕在当地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尽管清朝初期一直贯彻防止蒙汉接近的政策，入关后的顺治皇帝也一度下令：“各边口内旷土，听兵垦种，不得往口外开垦牧地。”但是，这种状况直到康熙八年（1669年）的一道谕旨颁下发生了改变：“旗人无地，亦难资生，应否以古北口边外空地，拨给耕种。”康熙九年（1670年）二月户部遵谕：

“今以古北口外地拨与镶黄、正黄旗，岭口外地拨与镶白、正黄旗；张家口外地拨与镶红旗、镶蓝旗。”在承德地区圈地占庄，对蒙古族为主居住的这一地区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大批皇庄、旗人庄田的建立，汉族农民的不断徙入，沿边墙一线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农作物种植区，像“敖汉、奈曼等处田地甚佳，百谷可种。如种谷多获，则兴安等处不能耕种之人就近贸易贩余，均有裨益。不须入边买内地粮米，而米价不至腾贵也”。直接采用内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其粮食亩产量甚至能够超过内地北方的一些地方。于是，承德这片土地到处是农耕人的身影。历经康雍乾三朝，承德地区由一个蒙古民族游牧区变为半农业区和农业区，承德地区开始形成独特的商业区。

清代承德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其次在行政管理上表现为由单纯的盟旗制管理到盟旗制与府厅州县制结合的二元管理体制。随着承德地区的开发，到康熙后期这里已是半农半牧区，康熙帝力图使农牧“各得生理”，友好相处，于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在古北口六路种地民人处设副将同知管理，负责办理内地农民在蒙古耕种事宜。到了雍正元年(1723年)热河设立直隶厅，第二年增设热河总管，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在热河设直隶州，政治上一改过去以盟旗制度为基础的间接统治为政府直接统治，加强了对该地区的统治职能。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认为：“热河地方，朕每岁木兰秋狝，市肆殷阗。……已俨然一大都会，而名称仍旧，殊与体制未协。”此处正式设立承德府，下辖平泉州、滦平县、丰宁县、赤峰县、建昌县、朝阳县；清朝后期为了解决财政和边疆危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宣布蒙地放垦，二十九年升朝阳县为朝阳府；析平泉县、建昌县之地设建平县；在土默特左旗设立阜新县。建昌、建平、阜新三县隶于朝阳府。三十四年升赤峰县为赤峰直隶州，置开鲁县、林西县和绥东县。宣统元年(1909年)划分出丰宁县西北之地为隆化县。三年，在敖汉增设敖汉右旗，以老哈河为界与敖汉左旗相望。承德地区形成了盟旗与府、厅、州、县交错的二元管理体制。

清代承德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第三方面表现为清朝作为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朝，解决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仍是其重点。自康熙朝多伦会盟起，清政府日益加强与蒙古各部的联系。为达到“习武绥远”的目的，开辟了木兰围场，定期举行秋猕大典，规定了严格的蒙古王公随行出猎、定期围班制度，通过木兰秋猕，既展示了清朝中央政府强大的武力，又通过接见、宴请、赏赉蒙古王公、贝勒、贝子、额駙、台吉等上层人物，团结了蒙古诸部及西北少数民族，达到了使蒙古各部“合众一心”的目的。

对清代承德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不仅使我们看到承德由最初的“名号不掌于职方，形胜不闻于地志”的热河上营，发展为清廷第二政治中心的塞外都市，政治地位陡然上升，这一地位保持了近百年后又渐变为清朝无足轻重的边远小城的曲折发展过程，而且由该地区很早实现与内地行政管理一体化为清代以后内蒙古、新疆等实现与内地一体化提供成功的范例，清廷在该地区实行的积极的民族管理政策，成功地解决了中原中央长达两千年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关系问题。

三

清代承德地区是伴随着庄田的建立、开发，逐渐成为农业经济区的，在区域经济研究中，有的或将热河地区放在东北经济区，也有的或将它放在蒙古游牧经济区，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注意到它在清代 300 年间发生的重大变迁并呈现出的独特特点，应该作为独特的社会经济区域来研究。

首先，从自然生态环境看：清代承德地区，既不像东北那样有丰厚的黑土地，河流灌溉那么充分，也不像蒙古广大的草原始终是游牧地区，所以无论放在那个经济区域研究都不能反映出这一地区的特点。它处于游牧区与农业区的分水岭地带，自然条件对于发展农业来说远不比东北，但靠近长城地区又比较适于发展农业，随着大量农人的迁入，承德避暑山庄的建立、发展，有清一代这一地区发展为农业区、半农业区，这一变化在清朝前期缓解了长城口内的

人口压力，农业区的建立在当时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次，从经济环境看：这里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原来大量的荒地开始被农人开垦，蒙古游牧族看到雇佣农人开垦土地更有利可图时，渐渐将草场开辟为农耕区，农业区就这样建立起来。随着游牧区逐渐北移，农牧经济互补，人们的生产、消费都处于一个相互联系的经济圈内。

第三，从人文环境看：民族、民俗、民风比较接近，蒙、满、汉等民族杂居友好相处，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不断，相互影响。以民居为例，至今保存比较完整的承德市宽城县楸树沟的清代中期计庄头大院，就是汉式建筑外观，室内装修满族特色浓郁，满族南北炕的痕迹依存。三百多年来，形成了民族融合的趋势，就像当地流行的歌谣唱道：“和亲沟，喇嘛山，蒙满团结如泰山。天财梁，天财庙，满汉共管大寺庙。”他们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联系加强了。

第四，从政治环境看：都属热河都统管辖，受当时政策措施影响是一致的。承德地区清初都是蒙古各部的游牧地，他们由蒙古札萨克管理，定期会盟，统一于清朝确立的盟旗制度之下。清朝康熙时期随着民人的迁入，为了对塞外人口进行有效管理，设置了一系列行政建制，与盟旗交错分布。清末放垦后，蒙地人口增加、土地大量开垦，清政府设置了一批县级行政单位，最终在承德地区形成了府、厅、州、县与盟旗交错格局。

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区域是成立的。清代承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变迁呈现出的经济格局如农业区、半农业区的形成，直到今天这里仍然是农业区、牧业区的分水岭。

四

清代承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在清朝边疆开发中具有代表性。

首先，承德地区作为边疆开发起到了防止外来民族入侵的作用。清代承德地区位居长城以北，长城是中国历朝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清朝长城不设防，以蒙古部落为屏藩是康熙帝对中国古代治

边思想的一大贡献。木兰围场建立后，康熙帝每岁木兰行围，亲临蒙古草原，为的是“抚绥蒙古”，使其“并号雄藩，同奉职贡”，巩固北疆。在抵御和防范沙俄的入侵中，蒙古族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新疆、西藏、西南、东北等地的开发中起到的作用是相同的。然而承德的开发既早且没有战争伴随，所以这里被称为“文明福地”，但是它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发展迟缓，此中原因值得反思。

其次，清代统治者的少数民族政策在这里运用得最成功。有清一代这里没有出现大问题，乃至到今天蒙、满、汉等民族杂居友好相处，少数民族政策运用成功的经验值得深深汲取。据《钦定热河志·巡典》的记载，康乾两帝对蒙古各部的赏赐达324部次，涉及漠南蒙古十六部、漠北喀尔喀、漠西厄鲁特、青海、哈密等。在北巡中体恤民情，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二十七年（1688年）、二十八年（1689年）发放米、粮救济蒙地的灾荒。在康熙帝看来，“声教无私疆域远，省方随处示怀柔”，才能做到“万里尽庭扉”。避暑山庄建成后，在山庄大宴蒙古王公，所有这些，正像后人评价的那样：“列圣柔远绥邦，抚安华夏，皆操纵得道。”逐渐形成的年班、围班制度，每岁借木兰行围对围班的少数民族赏赐，尤其是避暑山庄建立后，对围班蒙古各部的赏赐每一年都不少于10部次，通过积极笼络边疆各少数民族上层贵族，增强其向心力。康熙帝这一思想被后继者尤其是乾隆帝所继承，岁举秋猕，年年在避暑山庄万树园举行蒙古包大宴，宴请各部蒙古，因蒙古崇信喇嘛教，修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普宁寺等寺庙。所以，避暑山庄及外八庙成为清朝多民族国家巩固统一的象征。

第三，清代承德地区最早实现了与内地的一体化，为北部蒙古、西北新疆实现与内地一体化提供借鉴。我们以新疆地区为例，新疆自元末迄明，迭经战乱，准噶尔内部纷争，干戈扰攘，社会生产一再受到严重干扰。乾隆中期，两度用兵，彻底铲除地方割据势力，实行直接行政管辖。随着清政府对新疆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先开发新疆的农业，促使新疆农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工、商、矿、牧

各业繁荣，经济格局变迁；为稳固该地区，与各少数民族上层建立良好的关系，放宽了新疆各族人民间的接触往来政策和聚集开发的限制；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朝在此地设立行省，以单一的州县制取代原有的以军府制为主体的多元化行政管理体制，实现了与内地的一体化。承德地区与新疆地区相比，都由战乱走向安定，开发农业，引发经济格局变迁，政府加强统治，两者实行的政策相近，但承德地区比新疆早了一个世纪。

清末承德经济发展中，为缓解人口生计压力，木兰围场全面放垦，对此地实行掠夺性的开发，在准备开荒耕种的坡地，采取先行伐去乔木割除灌木，而后放火烧杂草及残存树木枝叶，再顺山漫撒种子，更有的刨树根开烧锅，断绝林木生长，使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清初“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落到饭锅里”，如今，野生动物四散逃遁，一些珍稀品种绝迹或濒临绝迹，遗患至今。为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今天的开发中更要做的是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保护原本的生态环境。

在经济发展中兼顾政府行为和自然因素结合上有可吸取的教训。清代以承德为中心形成了独立的社会经济区域，它前期的开发发展中政治、军事的因素多于自然的因素。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前这里只是热河上营和热河下营两个小村落，随着木兰秋狝举行、避暑山庄的建立，这里逐渐成为清廷前期第二个政治中心，鉴于承德地区军事、政治地位的重要，康乾二帝在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建设这一地区，所以在康乾二帝统治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承德地区迅速发展。随着晚清政治格局和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清政府注意力的转移，投入逐渐减少，甚至完全放弃，承德地区的发展速度趋缓，纯自然经济因素带着承德地区经济慢慢走向近代化，在全国的地位迅速衰落。清政府的投入力度决定了它的发展速度。这种经济发展对于政府投入的过渡依赖，在承德地区的经济变迁上显得尤为突出。今天承德经济发展中要想走出这个怪圈，就必须利用区域优势、资源优势、旅游优势，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清代初期避暑山庄建立前的承德	1
第一节 承德历史地理概况	1
第二节 清初期对承德的政治管辖	6
第三节 清初承德的畜牧业经济	23
第四节 清初承德的农业开发	34
第五节 清初承德的状况	51
第二章 清代中期承德社会经济的发展	60
第一节 避暑山庄的建立	60
第二节 发展时期的承德二元行政管理体制	74
第三节 发展时期的承德经济结构	108
第四节 发展时期的承德社会巨大变迁	144
第三章 清代后期承德社会经济的变迁	159
第一节 避暑山庄的衰落	159
第二节 清朝末期对承德地区的管理	174
第三节 承德中后期的经济延缓	188
第四节 承德后期的状况	212
第四章 木兰围场的兴衰	221
第一节 木兰围场风貌	221
第二节 木兰围场的建立与八旗驻防	223
第三节 围场的围班制度	229
第四节 木兰秋狝大典	234
第五节 木兰秋狝的衰落	239
第六节 清中后期围场封禁政策的改变	250
参考文献	257
后记	262

第一章 清代初期避暑山庄建立前的承德

第一节 承德历史地理概况

一、承德的历史地理位置

承德又名热河，位于古北口外东北约 100 公里。处于华北地区的滦河流域、燕山山脉与北方草原的接壤带。因为燕山山脉地势高峻，“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东西千里，山峻相连，近在都畿，易于据守。”^①成为古代中原朝廷与塞北少数民族之间战守进退的必争之地。因其在草原带上，自古以来，不仅是我国许多游牧民族的故乡，还是华夏族（汉朝以后称汉族）与游牧民族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政治往返、民族融合最为活跃的地区，也是沟通中原地区与蒙古草原的一条重要的交通要道。

这里自北而南，有相互毗邻的呼伦贝尔草原、科尔沁草原、乌珠穆沁盆地、上都牧场。在浩瀚绵延的数千里草原上，滦河水系的许多河流皆分布其间，有乌尔扎河（今名乌尔逊河）、喀尔喀河（今名哈拉哈河）、乌尔会河（今名芦河）和西拉木伦（潢河）。由于河流纵横、牧草茂密，气候温和，这里曾孕育了我国历史上许多优秀的民族，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演绎了这些民族发展、强大的轨迹。

^① 李鸿章等撰：光绪《畿辅通志》卷六一，关隘一，顺天府，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点校本。

迭相兴起了东胡、匈奴、鲜卑、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他们不断发展、壮大，进而登上了中国历史的大舞台。如战国时期即生息于今西拉木伦与老哈河流域的东胡，其南境曾包括燕国所置的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①。秦汉之际，匈奴冒顿单于灭东胡部落联盟后，东胡部落联盟中的一支——鲜卑人，兴起于今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的鲜卑山一带，另一支乌桓人兴起于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的乌桓山。建立北魏的拓跋鲜卑兴起于内蒙古草原的东北角，即今之额尔古纳河东南^②。建立辽朝的契丹族也兴起于东胡的故乡——西拉木伦和老哈河流域。自从辽宋以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日渐凸显。

《太平寰宇记》引《冀州图》记载：

入塞三道，自周秦汉魏以来，前后出师北伐，唯有三道。

其中一道，正北，发太原，经雁门、马邑、云中，出五原塞，直向龙城，即匈奴单于十月大会祭天之所。

一道，东北，发向中山，经北平、渔阳，向白檀、辽西，历平刚，出卢龙塞，直向匈奴左地，即左贤王所理之地。

一道，西北，发自陇西，经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历伊吾塞，（直向）匈奴右地，即右贤王所理之地。

这三条通道，就是蒙古草原与中原地区相互沟通的传统路线。

随着契丹、女真、蒙古游牧民族相继在靠近塞外的地方建立起本朝的政治中心，北京也逐渐成为我国北方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样一来，东道对于塞外民族来讲，更为重要。因为塞外民族一旦掌控了这里的燕山群峰、滦河流域，凭借往来倏忽、剽悍善战的草原骑兵，就可以势如破竹，突破长城薄弱的隘口，进逼

①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卷一一。

②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一章第二节、第四章第一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燕京，乃至席卷华北平原。所以东道的各个出口，诸如义院口、冷口、喜峰口、罗文峪口、龙井关、古北口、墙子路、居庸关、独石口等地，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其中，古北口密迩北京，近在咫尺，是直取北京的咽喉要道。为此，顾炎武曾这样论述古北口的重要：“唐庄宗之取幽州也，遣刘光溶克古北口；辽太祖之取山南也，先下古北口；金之灭辽，希尹大破辽兵于古北口；其取燕京也，蒲莧败宋兵于古北口；元文宗之立也，唐其势屯古北口，撒敦追上都兵于古北口；秃坚帖木儿之入也，太子出光熙门，东走古北口，趋兴松。”^①这些无不以古北口为突破口。反之类推，如果一个政治集团占据了燕京（北京），为了确保燕京和华北平原的安全，也必须牢固地控制燕山、七老图山和与之毗连的坝上高原。如成吉思汗夺取金中都（北京）后，即派合撒儿领兵攻取金之北京大宁（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县境内）^②。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历史的教训，也曾派其子宁王朱权统劲兵镇守大宁。燕王朱棣发动“靖乱”，袭夺朱权之兵南下，攻打惠帝朱允炆，兀良哈部蒙古又助朱棣有功，朱棣即位后，“改北平行都司为大宁都司，徙之保定，调营卅五屯卫于顺义、蓟州、平谷、香河、三河，以大宁地界兀良哈。自是，辽东与宣（府）大（同）阻绝，又以东胜孤远难守，调左卫于永平（今河北省卢龙县），右卫于遵化，而墟其地。先是兴和亦废，开平徙于独石，宣府遂成重镇。”^③这样的安排其实是为了奖赏有功的兀良哈部蒙古，但是从军事防守的角度讲等于敞开了兀良哈部蒙古内进的大门，使燕京的藩篱尽失，因此，明代的“塞防”危机日趋严重。这又从反面印证了这一地区位置的重要性。

正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生活在这里的民族相继建立起许多重要的要塞和政治中心。如战国时期燕将秦开的开拓燕塞五郡，西汉

① 顾炎武：《昌平山永记》卷下。

② 额尔登泰、乌云达费校勘：《蒙古秘史》二五三节。

③ 《明史》卷九一，《志》六七，《兵》三。

李广之守右北平，三国时曹操出卢龙塞伐三郡乌桓，都在滦河流域周围。唐末以后，辽金元在塞外建有政治中心，如辽之上京、中京，金之北京，元之上都，都在古北口塞外。这一带与中原的交流、往来也十分密切，是许多中原王朝与边地民族进行贸易、互派使者往来的必经之路，因此，也成为重要的交通要道。比如，宋辽和好极睦时，宋朝的使节富弼、欧阳修、刘敞、苏辙、王曾等人使辽，都是出古北口^①。元末，元顺帝退出大都后，他所据守的应昌城，即在木兰围场以北二百余里的达里诺尔湖滨。明初，明成祖北征，班师时病逝于木兰围场以西的榆木川——今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境内。

清朝建立后，满蒙结成巩固的联盟，这里不但成了中原王朝的后花园，而且还成了团结北方各民族的中心地。

二、承德的历史地理环境

承德不仅地理位置重要，而且其历史地理环境也极为优越。

承德地区最北部是自西向东绵延的阴山山脉，海拔约 1400~1700 米，最高处 2000 余米。承德北部的两个县，名丰宁、围场，俗称坝上。在围场县的坝上部分，称塞罕坝，蒙语名塞罕达巴汉（美丽的山岭）。围场县的东北角，是阴山余脉、大兴安岭余脉和七老图山的交汇处。七老图山由围场东部向南延伸至隆化县、承德县、平泉县境内，是承德地区与内蒙古昭乌达盟的分水岭，海拔在 1000~1500 米左右。塞罕坝以南，七老图山（在隆化县东部的一段名茅荆坝）以西的山地，属燕山山脉，高度在 1000 米以下，至承德市周围，环抱的群山海拔高度约 400~700 米，河谷平原海拔仅 320 米，一直到滦平县，山势与承德市周围大致相同。坝上高原和七老图山像是两道互相连接的“^”形天然屏障，它削弱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对坝下的侵袭，同时，又将顺滦河、潮河流域上溯的海洋

① 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一三《富弼传》；卷三一九《欧阳修、刘敞传》；卷三三九《苏辙传》。《辽史地理志》所引王曾《上契丹书事》。

性季风、温暖气流阻挡于坝下，使坝下地区的雨量充沛、气候温润，有利于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繁殖。

这里直到清朝前期，从坝上高原直至长城线上古北口的大面积范围内，森林相当茂密。坝上属森林草原带，辽代有“平地松林”，“千里松林”之称^①。坝上的原始森林主要树种是落叶松、樟子松。康熙年间的木兰围场境内，山岭上森林蔽日，一碧万顷。比如半截塔生吉儿岭一带，“黄叶数十万株，交枝接干，无复罅隙，翘首望之，如海日初出，一派金光，目为之夺。数万骑缘崖而上，恍如仙子行金云中，人马俱作黄色，虽邓尉之梅花，富阳之枫叶，不能与之伯仲。”乌兰哈达（今县城锥子山）一带，“山径崿崎，古松奇矫，若群龙之浴于海。……商人伐巨松，成段散置河干，遇积雨水涨则顺流出山。”^②伊玛图河两岸，“沿岭皆落叶松”。围场东部向南延伸的七老图山，山上也长满了大面积的针阔混交林。毗连围场县北境的克什克腾旗境内，从乌兰布通峰（今名大红山）“折而东北，至木石峡（河）三百余里，皆产木之山”^③。围场县西的多伦县境内，也有绵延不绝的原始森林，分布在乌兰坝、核桃坝一带。当时承德周围的山岭也遍布着原始森林。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张诚在《第八次鞑靼地区旅行记》中，记载他路经承德地区时，见喀喇沁旗蒙古王公欣放的木排置于滦河支流，等待山水冲下，流进关内贩卖，这是当时森林蓊郁的有力证明^④。承德市东南宽城县境内的都山，西南兴隆县境内的雾灵山，也长满了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雾灵山“山之左右峰峦攒立，深松茂柏，内地之民，多取材焉”^⑤。承德市正南的滦平县境内，清人李调元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

① 康清源等撰：民国《经棚县志》卷十三。

② 汪颢：《随奎纪恩》，《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帙，杭州古籍书店光绪丁丑。

③ 金志节原本、黄可润增修：乾隆《古北口厅志》卷七，《蕃卫志·克西克腾》。

④ [法]张诚：《张诚日记·1692》，《清史资料》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⑤ 《大清一统志》顺天府二。

出口时,见“两山多树”^①。可见,直到乾隆时,承德地区的原始次生林依然存在,弘历在诗中写道:“萦绕石栈弹鞭过,苍绿千林锁髻螺。”“鸣梢旋渡玉关雄,秋老林岚飒飒风。”^②据估计,承德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在50%~70%左右,而围场境内可高达70%。承德市周围也是苍山滴翠,层峦挺秀。群山都笼罩在莽莽苍苍的松涛树海里。狮子沟两侧从山顶至山麓,都长着密密扎扎的古松、老榆、巨槐、茂柏,漫山遍野都是“树木狼林”。

清初,由于人类的活动对本区的影响较小,茂密的森林草原为各种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例如:今建平县西部和北部在清朝是喀喇沁右旗和敖汉旗的一部分,《建平县志》记载:清初“当汉民出口耕种之初,草木畅茂,禽兽繁殖,有‘棒打孢子瓢舀鱼,野鸡飞掉饭锅里’之言(谚),物产之饶可概见矣”。靠近长城地区“泉甘土沃,农事滋繁”,“山爽朝来,水风微度,泠然善也”^③。总之,遮天蔽日的森林,青青的牧草,适宜的气候,养育这一方牧民,也由于当时的水资源、气候资源和动植物资源远较今天优良,为清代以来关内人口的迁入和经济的发展、为流域内人地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和自然地理基础,为木兰围场的开辟、农田的垦种提供了优越的地理环境^④。

第二节 清初期对承德的政治管辖

正是由于承德地区的地理位置重要,地理环境优越,再加上其

① 李调元:《出口程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6帙。

② 《钦定热河志·巡典》卷十九,《出古北口》(三十四年作);卷十五,《进古北口》(十年作)。

③ 《大清一统志》卷四“顺天府”。

④ 有关承德历史地理状况参考袁森坡《论避暑山庄建立的历史背景、位置和历史地理环境》,载《避暑山庄论丛》,紫禁城出版社出版1986年。

坚定的盟友——蒙古即在塞外，因此，清朝非常重视对它的管辖。

一、清朝对承德地区的收服

明朝末年，蒙古部落分为漠南、漠西卫拉特和漠北喀尔喀三大部。其中漠南蒙古中的察哈尔部势力最大，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不地汗去世，其长子达赉逊（打达孙）即大汗位，尊号“库登汗”。库登汗统治时期，由于当时的驻牧地自然环境条件恶劣，而且蒙古右翼俺答汗势力壮大，因此库登汗决定率领蒙古左翼万户东迁至辽东一带，这样既可以享受那里的丰美水草，又可以借机躲避被蒙古右翼兼并的威胁。蒙古左翼东迁后，察哈尔万户驻地分布在老哈河以东，辽河以西，西拉木伦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广袤草原上。其“东起辽西，西尽洮河，皆受插（察哈尔）要约，威行河套以西矣”^①。拥有八大营二十四部，后来的热河境也尽归其属。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布延汗长孙林丹汗即位，满怀统一蒙古壮志的林丹汗决心积蓄力量力图复兴。为了实现其复兴大业的伟大理想，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林丹汗连续三次攻掠明边，广宁一度被攻陷。然而，当时蒙古的外部形势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图门汗时代作为蒙古附庸的女真族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下迅速成长起来，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后金国。后金对蒙古采取渗透、拉拢和瓦解的战略，不断争取科尔沁及喀尔喀诸部；努尔哈赤对于不肯听命的其他诸部则施以兵威，征而服之。女真族的壮大及其不断暴露的扩张野心，使蒙古林丹汗感受到了潜在的威胁。

这时蒙古的科尔沁、喀尔喀诸部为了寻求自保，也希望与后金保持良好的关系。察哈尔本部中，敖汉与奈曼部在此时与后金也发生了联系，就在敖汉与奈曼部处于徘徊之际，林丹汗亲率大军进行讨伐，残酷的兼并行为反而将敖汉与奈曼两部推向了后金，明天启七年（1627年）六月，敖汉部、奈曼部率众归附后金。

^① 彭孙贻：《山中闻见录》，《西人志》。